



邓中夏对党的宣传工作的探索

□ 潘丽文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我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他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的首任宣传部长，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就是革命先驱邓中夏。

1894年，邓中夏出生于湖南宜章的一个书香之家。1914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在研究会基础上，发起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邓中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自1920年起，他先后参与和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组织力和号召力与他的杰出宣传工作能力是密不可分的。

邓中夏长期在北京长辛店从事工人运动，主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为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1922年5月1日，他被选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邓中夏被选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在负责组织和协调工人运动、创办工会刊物、教育培训工人过程中，邓中夏积累了丰富的的工作经验，对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索。

进行各种常识和知识的宣传教育。号召平民参加革命，首先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1920年10月，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记》发表《平民

教育講演团启示》，指出进行平民教育要将“各种常识”“时时说给他们听”。在1921年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中，邓中夏对宣传教育工人的内容方面作了一些建议，指出要“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讲明“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等。后来，他在1927年撰写的《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一文中又指出，“宣传教育为工人所不可一日缺乏之事”“我们要知‘智识即权利’，智识极可宝贵。我们要革命，如无革命知识便无革命行动”。

深入工农群众进行宣传教育。1925年，为支援省港大罢工，邓中夏组建了一支工人纠察队并起草了《纠察宣传队简章》。在简章中，邓中夏阐述了纠察宣传队的宗旨就是“宣传各驻防地方之群众，使之明白此次罢工之意义”，纠察宣传的任务是“宣传罢工之政策”“随时招集各地群众为大规模之宣传”。1925年7月，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之际，邓中夏发表了《怎样实行工农联合？——马上组织“农村宣传队”到农村去》一文，指出，“我们必得要派人到农村去宣传……也可以从此结成工农阶级之联合基础”。

宣传教育手段要多样化。在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兴起之际，1924年1月，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文中提出做农民运动的宣传教育方法应多样化：“能多设补习学校或演讲所固然很好，如一时力量来不及，利用现成的教育机关亦可。至于其他如露天讲演以及新年大节休暇时聚会娱乐尤应利用时机宣传，方法愈多愈好”。之后，在《论劳动运动》一文中，邓中夏又提出口号宣传的方式，强调对工人宣传教育时，“应把

从前那样大而无当的口号暂为收藏起来，把目前切实有用的口号代之，方于实际有益”。他还倡导通过开会的方式进行宣传。他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中就建议党组织利用学生会议进行宣传，他认为，“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

理论从实践中来，又进一步指导实践。从创办教育机构培养革命骨干，到出版进步刊物传播党的声音，再到参加集会演讲传播革命理念，邓中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工作。积极创建教育机构。在李大钊的支持下，邓中夏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并承担教学工作。他在学校中使用通俗简单的文字、语言，向工人普及文化知识和做工常识，同时宣传阶级斗争的知识。通过学校教育的宣传鼓动，长辛店工人的阶级意识得到了启发和提高。1924年，邓中夏在上海大学主持并召开了“筹备平民教育大会”，他和师生一起创建了吴淞中国铁工厂平民学校、杨树浦平民学校、小沙渡平民学校等。这些平民学校向工人讲授其生活困苦的原因是资本家和军阀的迫害，有效地促进了工人觉悟的觉醒。1925年，在省港大罢工期间，邓中夏开办了宣传学校和劳动学院，并亲自授课。宣传学校主要承担培养并训练工运演讲人才之职责，劳动学院主要承担传授工运知识之职责。通过这些学校教育，为党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宣传骨干。

创办刊物与发表文章。1920年11月，邓中夏参与创办了进步刊物《劳动音》，通过这一刊物，邓中夏向工人传播了关于工人运动、社会主义理念的知识，极大地提升了工人的革命觉悟。1922年，邓中夏参与创办进步刊物《先驱》并在上面发表《共产主

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先驱》是当时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重要刊物。1923年，邓中夏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会后，团中央在上海创办了机关刊物《中国青年》，邓中夏利用这个杂志对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宣传，在引导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邓中夏担任《工人之路》的主编并发表了《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生命》《工人阶级与革命政府》等文章。在他的指导下，《工人之路》成为宣传罢工工人、扩大党的影响的重要媒介。

参加集会演讲活动。1919年，邓中夏与其他学生一起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他作过多次演讲，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必要性。1925年9月，广东工农军政学商各界举行十几万人的游行示威大会，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并进行演讲，号召各界进行全国大革命。1926年1月，中国海员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邓中夏出席并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同时向海员发出“打破地方帮口之分”“大家共同奋斗”的号召。

邓中夏不仅长期负责领导工人运动，而且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斗争实践，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红色记忆

少陵原上杜公祠

□ 韩 伟

原，是一个描述地理地貌的常见字，在关中地区更常被写作“塬”，《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高平之野，人所登”。塬一般是指西北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四边陡、顶上平，简写作“原”。关中地区很著名的原地有五丈原、龙首原、神禾原、乐游原等。其实，西安南郊的少陵原也是颇有历史的，少陵原在汉代时本名鸿固原，是古代杜伯国的旧地，汉宣帝葬于此处，陵名杜陵，改称杜陵原。后来，宣帝皇后故去，葬在杜陵之南，陵墓较小，古时少小通假，遂改称为少陵原。

初冬的一个下午，信步行至西安城南之少陵原下，看见少陵公园的门牌，蓦然心动，想起了“少陵野老”这个名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自号“少陵野老”“杜陵布衣”，必是与少陵原有关联，于是在地图上一查，果然，杜公祠就在少陵公园以北不远处。

地图上标示得虽不远，但由于“塬”的地形复杂，走起来却几经辗转。到了杜公祠附近，仍不得其门而入，需要先步行上一道斜坡。行至半途，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牛头禅寺，这个寺庙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关中地区却很有名气，据说在唐代是樊川八大寺院之一，始建于贞观年间，很有些历史典故。

转弯绕过牛头禅寺，就从正面看到了杜公祠。杜公祠，是后世为纪念杜甫而建，最早建于明嘉靖年间，原址在牛头禅寺西南一里，清乾隆年间毁于火灾，嘉庆九年重建于牛头禅寺以东，也就是现址。因为素来敬仰杜甫，敬仰他的诗风诗魂，更敬仰他心忧国运、关心民瘼的情怀，所以我一直对他的生平和诗文创作很感兴趣。

杜甫一生游历多地，所以多地也建有杜公祠，仅在陕西，就有西安、延安两处。今日造访的便是位于西安城南少陵原的杜公祠。

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但其远祖曾隶属于长安杜陵，现代诗人、学者冯至在其所著的《杜甫传》中称杜甫是晋代名将杜预的第13代孙，杜预就是京兆杜陵人，其后代才迁居河南巩县，因此，杜甫之于长安，并不仅仅是一个客居者。对杜甫的生平居所，人们更熟悉的是成都的杜甫草堂，以及那首著名的歌行体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但那是诗人在晚年颠沛流离时期的暂居之所，居住了不过4年时间。检视杜甫的一生，恐怕对他影响更大的，还是冯至所言的“长安十年”。天宝五年（746年），杜甫来到长安，他胸怀大志、意气风发，想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虽然因政治腐败未能高中，但在长安却留下了他一生难忘的记忆：与久已仰慕的李白、高适游历山水、畅饮论诗。

751年之前，杜甫在长安附近没有固定的住处，所居多半是客舍。到了中年后，更多时候寓居于长安城南的杜陵、樊川一带，才算是定居，说是“长安十年”，实际上他在长安的时间前前后后总共有13年。在此期间，他自号“杜陵布衣”“樊川野老”，充满乡土之情。他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以悲悯的情怀，描述了底层民众生活的疾苦。那首著名的《蚕谷行》，“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反映了战争对百姓生活的摧残，以及他对平静美好田园生活的无限向往。

在长安，杜甫真切地看到统治阶



层的荒淫腐朽和百姓的困苦生活，正如冯至所言，杜甫的步履，“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互竞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他在诗中表达了对统治者仁政之失的惋惜，“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要昆仑丘”，进而对百姓的深重苦难充满了同情。

迎着杜公祠，一路拾级而上，两侧石栏上雕刻着杜甫的诗句，如《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尽少年意气盛之气概；如《赠卫八处士》，“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流露出沧桑之感慨……我一边走一边吟咏这些诗句，仿佛在跟随诗人的人生步伐，体味诗人的沉郁悲叹。

在杜公祠正堂观展出的杜甫诗文著述后，出得门来，举目远望，对面便是暮色苍茫中的秦岭山峰。回过头来，看到一棵200多年树龄的古槐树，将繁壮浓密的树冠探入杜公祠院内，衬得祠堂更加幽深静谧。我想，千年前的杜公也一定曾这样远眺苍翠巍峨的秦岭终南山，他不知多少次渡

过附近水流充沛的滴河、浐河，去细细地观察甚至亲身体验农人的辛劳。我似乎看到了一位久试不第、年近不惑诗人的身影，他衣着素朴、举止深沉，行走在河边、往来于田间，时而沉静凝思，时而与农人畅谈。

从杜公祠正门返身下来，映入眼帘的是茅草木门牌坊，上书：“情系苍生无愧诗坛圣哲，心在魏阙岂是杜陵布衣。”这副楹联语义直白，却意蕴丰厚，是对杜甫忧患精神的高度概括。

时间倏忽而过，天色已晚，归程路上，感慨万端。千载已过、逝者如斯，杜甫之所以长久地被人们铭记，不仅是因为他诗文中的才华，更在于他情系苍生，他不仅以诗言志，更以诗叙事、悯人，人们能长久怀念、纪之！



《论语》中蕴含的经济理念

□ 闫培英

《论语》是一部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它详细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集中反映了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主张，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仔细研读《论语》，不仅能够了解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思想，也能够感受到孔子的经济理念。

轻利重义、见利思义的“义利”主张是《论语》中重要的经济理念。这里的“利”泛指利益，包括财富。孔子肯定追求财富的正当性，在“述而篇”中，孔子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坦诚地表达了对财富的追求意愿。但孔子强调求富应有其道，在“里仁篇”中，他明确表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认为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但如果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得到的，宁守清贫也不愿去享受。他虽认可求富的行为，但也反对对利无限地追逐，即所谓“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认为取利必须合乎义，因此见利时必须想到义。在“宪问篇”中他提出要“见利思义”，意指人在面对利益时，要坚守道德和正义。这里的“思”并不只是简单的一种思考，而是在行动之前的道德评估和审视。他又讲“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强调取财应该以道义为先，在讲道义前提下获取财物，不会被人厌恶。在“里仁篇”中，孔子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的行为是受道义和原则指引的，而“小人”的行为则完全出于私利，通过“君子”与“小人”行为的对比，阐明了义高于利的主张。“述而篇”中又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义的财富对自己来说好比浮云，他反复表达了轻利重义的态度。

孔子主张节用、克俭。在“学而篇”“八佾篇”“述而篇”“子罕篇”等篇章中，孔子分别提出“贫而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君子忧道不忧贫”，“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孔子从“礼”“丧”等衣食住行方面提出要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同时也主张君子应该安贫乐道。表达了其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强调内心修养和简朴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在“雍也篇”中，孔子赞扬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其乐”，做到了安贫乐贫。在“学而篇”中，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强调执政者应秉持节约之道，兼施仁政。而在“里仁篇”中，他进一步指出，“以约失之者鲜矣”，懂得自我约束再犯错的人是很少见的，提倡自律和克制，遵循礼法。

在国家治理层面主张平均贫富、轻赋薄敛、注重富民也是孔子经济理念中的重要成分。在“季氏篇”中，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强调了平均贫富的重要性，他认为

无论是诸侯或者士大夫，不担心财富太少，而担心财富不均；不担心人口少，而担心不安定。因为分配均匀，就不会有贫穷；上下和睦，人口就不会少；社会安定，国家就不会出现倾覆的危险。孔子极力主张实施轻赋薄敛的政策，“先进篇”中有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对于此说道“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违背了孔子倡导的政治主张，帮助季氏聚敛财富、盘剥百姓。孔子没有对冉求姑息，而是严厉指出了他的过错，并要所有的弟子对他进行声讨。

孔子认为“富民”对于国家治理至关重要。“颜渊篇”中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意为充足的粮食和军队，才能赢得百姓信任。百姓富足乃是国家富足、政权稳定的前提。如何使民富？孔子在“学而篇”中提出“使民以时”的主张，要求统治者不滥用民力，及时保证农时的需要，不影响生产。民富后又怎样呢？“子路篇”中讲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把人口与财富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了“先富后教”的观点，认为人口充足、经济富裕是德教的基础。孔子重视教化，但并不凭空言道，而是明确教化是在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成效的。

《论语》中蕴含的丰富经济理念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不仅在古代有深远的影响，对现代社会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后世研究和借鉴。

